·经济与社会变迁系列丛书·

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

吴景平　主编
曹嘉涵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曹嘉涵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8
（经济与社会变迁系列丛书）
ISBN 978-7-5473-0809-7

Ⅰ.①抗… Ⅱ.①曹… Ⅲ.①中美关系—抗日战争—史料—研究—1941～1945 Ⅳ.①K265.06②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8213 号

抗战时期中美租借援助关系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237 千字
印　　张：15　插页 2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809-7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总序 …… 吴景平

绪论 …… 1

一、问题缘起 …… 1

二、文献评论 …… 3

三、研究意义 …… 11

四、资料与方法 …… 13

五、主旨与篇章 …… 18

第一章　中美建立租借援助关系的背景 …… 20

第一节　抗战初期中国美援外交的再探讨：以易货借款为中心 …… 20

一、陈光甫驻美求援工作评析 …… 22

二、宋子文与美援外交局面的拓展 …… 37

第二节　美国租借援助政策的出台与影响 …… 46

一、《租借法》及相关法案的颁行 …… 46

二、府会关系变化与行政机构的调整 …… 52

第二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租借援华的实施 …… 55
第一节　美国租借援助机制的发展 …… 55
一、防御援助汇报处时期的租借援助制度 …… 55
二、租借事务管理署成立后的租借援助制度 …… 61
第二节　宋子文与租借援助的接洽 …… 65
一、租借援助政策出台之初的应对 …… 65
二、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创建与美援外交体制的重组 …… 69
三、中国银行工作路径的开辟 …… 81
第三节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主要工作与美军方反应 …… 89
一、申请租借援华物资 …… 89
二、营运租借援华物资 …… 97
三、参与美国志愿航空队初期建设 …… 110
四、美国军方的反应 …… 114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租借援华的实施 …… 122
第一节　美国租借援助机制的转变与中国的因应 …… 122
一、租借拨款方式变化与物资划拨决策权的移转 …… 122
二、中国美援外交体制的再调整 …… 127
三、中国对英美联合参谋长会席位的力争 …… 137
第二节　中美租借援助物资主导权之争 …… 140
一、初次交锋：塔尔萨事件的来龙去脉 …… 140
二、史迪威来华与美国主导租借物资格局的显现 …… 145
三、宋子文的两次回击 …… 155
四、史迪威管理租借物资职权的削弱与丧失 …… 159
第三节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工作的延续与终结 …… 162
一、缅甸陷落前的工作情况 …… 162
二、缅甸陷落后的工作情况 …… 171

三、公司关闭与移交 …… 176

第四章 中国对美国的租借援助及其交涉 …… 181

第一节 回惠租借援助的实施与协议草案的商讨 …… 181

一、驻华美军的食宿服务与货币供应 …… 182

二、回惠租借援助协议草案的提出与讨论 …… 186

第二节 围绕驻华美军开支清算的进一步互动 …… 192

一、回惠租借援助协议的流产 …… 192

二、驻华美军开支问题的解决 …… 197

结语 …… 205

参考文献 …… 212

后记 …… 22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表目录

图 2－1　防御援助汇报处时期的租借援助机制图 …… 59
图 2－2　租借事务管理署成立后的租借援助机制图 …… 63
图 2－3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设计国民政府租借物资箱件运输标志 …… 98
图 3－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租借援助机制图 …… 128
图 3－2　中印空运每月吨数走势图(1942.5—1943.12) …… 174
表 1－1　宋子文致罗斯福备忘录附中国军用物资清单(1940.7) …… 39
表 2－1　《第一租借拨款法》租借资金部门分配情况表(1941.3.11—8.31)…… 56
表 2－2　租借物资申请单接收分布数量表(1941.3.11—8.31) …… 58
表 2－3　《第一租借拨款法》租借资金配额使用情况表(1941.3.11—11.13) …… 64
表 2－4　美国援华租借物资初次申请与审核情况表(1941.4) …… 67
表 2－5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设计国民政府租借物资用料机关箱件区别标志 …… 98
表 2－6　1941 年 5—12 月援华租借物资船运情况表 …… 100
表 3－1　美军运输租借物资通用标志示例说明 …… 155
表 4－1　国民政府财政部拟 1942、1943 年度国库支拨回惠租借款项参考表 …… 188
表 4－2　国民政府垫付驻华美军开支清单(1942.9—1944.4) …… 199

总　序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无论农、工、矿等产业，商贸和运输通讯业，以及财税、金融等领域，无论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诸环节，都发生过前所未有的变化，涉及的内容广泛、层面丰富、问题复杂，一直是人文社科学者致力研究的对象，不少成果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如果仅就生产力的角度看，相比较其他产业和经济事业，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变化不大；传统土地所有制和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业制度架构也没有发生重大变革；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得近代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得以形成甚至固化。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加快；农业的角色转换中，增加了工业原料的供应者和商品的销售市场，农业业态也趋于多样，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在局部地区和部分农业领域已经出现，农村的面貌以及农民的状况，都有了较大的变化，虽然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始终存在着。农业在维系民生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支撑国用方面的重要性，社会各界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

中国的近代工业起步于洋务运动，矿业更是有赖于工业市场和近代交通业的兴起。在近代工矿业中，既有业主和雇员的明确分野甚至对立，也有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采行。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工矿、商贸和运输通讯等行业是近代城市形塑进程中的主轴，是城市从业人口构成中的主要部分，近代中国城市往往集经济、政治、文化和中外交往等诸方面功能于一体。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新增城市人口说到底来自农村；而工业化在原料、市场、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方面同

样离不开农业和农民。一方面，乡村与之城市间的差别和联系、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差别与联系，构成了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而另一方面，商业与交通业的发展，既使得上述差别得以凸显，也是缩小差别、强化联系的重要力量。

官商关系，伴生于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全过程和主要方面。自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起，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事业相继形成和长足发展，官商之间、朝野之间既有分、又有合：军工企业均为官办；民生工业基本商办；新式交通和通讯企业则多为官督商办；新式银行以特许商办（中国通商银行）起步，政府银行则官商合营，政府实际上控股。总体来看，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起步的时候，官股的主导地位和商股权益之间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既与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依然存在有关，也因为当时针对商人和民间资本的制度安排较为宽松。而到了内外时局激烈动荡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逐渐掌握了主要经济产业，国家金融体系得以建立和强化，国家资本和官办企业掌控着经济命脉，这些虽然有助于应对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潮，并增强了抵御外敌入侵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导致了市场关系扭曲，经济运作失序，最终由社会危机引发社会变革。

晚清以降，经济领域新的制度性安排引人关注。与传统的农业和旧式金融业不同，近代工矿业、交通及通讯业和银行业均有准入和运营监管，财税和货制方面的演进更与各行各业乃至所有社会成员紧密相关。进入民国之后，经济领域的制度性建设取得长足的进展并渐臻体系。如果仅就某一经济法规的具体文本而言，似乎都顾及各经济要素的齐全与合理配置，但其运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文本的“学理”如何，更受到实际“事理”即市场和社会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盐税和统税改革为例，就整体而言无疑是中国税制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无论征收、保管还是使用，都会因特定情势而影响其成效；对不同的财税关系方，也会有迥然不同的利害关系；这些财税改革说到底没能帮助国民政府摆脱财政困境和避免财政彻底破产。再分别看看废两改元、法币和金圆券三大币制改革政策，其成败得失，均非其制度性文本铁定，尤其是法币历经抗战八年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其完全破产则是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两年后；而在军事败局已定、政治与社会危机全面爆发的情况下，随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崩溃，包括金圆券在内的任何币改方案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史实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经济运行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而其效果也必须经受社会的检验

判断。

中外关系,是考察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又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意义的工矿业、商业、交通通讯业和金融业,基本上都是外资企业。毫无疑问,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并取得过支配性甚至垄断性地位,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华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确实有过相当的负面作用,这与近代中外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在华种种特权和势力范围密切相关。但是,除去种种非经济的因素之外,在华外资企业在产品开发、市场开拓、资金获取方式和运用效率等方面的优势,也是刺激与催生近代华资新式企业和经济事业的重要因素。进入民国之后,虽然越来越多产业中的企业数、资金数、从业人员数、所占市场份额等方面,华资企业的发展更快,但华资新式企业包括经营管理在内的基本制度的建构和运行,依然离不开对外资企业先进因素的借镜;外资企业与华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说到底是商品市场必然产物,这种竞争关系在外资企业内部和华资企业内部,同样也是存在的。而从近代中国产业运行与市场的关系来看,在华外资企业与华资企业一样,都是整体意义上的近代中国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宏观意义的中外经济关系,至少还包括与近代中国直接相连的世界市场、主要的国际行情等因素。事实上,中外贸易和经济往来的发端,远早于近代意义的华资企业萌生之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近代转型,离不开与世界市场的密切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经济遇到过种种不利的外来因素,如金贵银贱、"镑亏"、世界性的经济萧条、白银风潮等,相关华资企业、产业甚至政府当局都无法回避,只有积极应对一途。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面临日本扩张及至全面入侵的年代里,维系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除了固有的外贸属性之外,更有着争取国际援助、拓展外交空间的战略意义。

本《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丛书》业已确定的选题,多为专门性个案研究,有着特定的时间和区域、企业和政府、实际运作和制度供给、实业家与决策者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但又都置于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反映出这一变迁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关的文稿均为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在史料详尽、征引规范、叙事平实、立论公允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除了研究专书之外,本丛书选题范围还包括专题论集、专题史料文献的选编等。我们期待着读者同仁的关注。

吴景平

2015年7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绪　论

一、问题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美国为携手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而结成军事同盟，并肩作战，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史中的闪亮篇章。作为战时中美同盟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中国的租借援助为中国赢得抗战和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中美围绕租借援助展开的一系列军事、经济与外交互动，虽不乏波折，但却使中国逐步走上世界主要大国的活动与交往舞台，奠定了中国在战后国际新秩序中的大国地位。因此，研究抗战时期的中美租借援助关系，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御击外侮的艰苦卓绝，体察中美互动与中国大国身份形成的历史经验，无疑具有特殊而关键的价值。

1941 年 1 月 6 日，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时，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国会山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中，他要求参众两院授权并拨款制造武器与军用物资，提供给那些正在与法西斯力量斗争的国家，并允许这些国家在战后以相应实物或劳务形式归还，从而使美国真正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①]。随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相继通过《租借法》(Lend-Lease Act)，授权总统认为在某国的国防对美国国防有利时可向该国提供租借援助。《租借法》的出台，使在黑暗中孤军奋战多年的中国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不久，美国便将中国纳入了租借援助的对象范围，开始单方面向中国提供军

① ［美］富兰克林·罗斯福：《致国会的年度咨文(1941 年 1 月 6 日)》，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276—277 页。

火物资与运输通讯设备。为此，时以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驻美的宋子文在华盛顿创办中国国防供应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 Inc.)，作为负责申请、营运美国租借援助物资的专门机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军事同盟关系正式确立。1942 年初，罗斯福指派陆军中将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来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授权其指挥驻华美军，同时负责监督美国的援华租借物资。6 月 2 日，宋子文以中国外长身份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该协定在确认中国获得美国租借援助权利的同时，也正式规定了中国向美国回馈租借物资或其他形式服务的义务。1942 年下半年起，中美两国以互助为原则的双向租借援助关系正式形成。美国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的同时，中国也以回惠租借形式向驻华美军及美国在华官方机关提供食宿服务，帮助修建机场并直接垫付法币。194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宣布继续对华实施租借援助。同时，中国也仍向驻华美军垫款。中美租借援助关系并未因抗战结束而中止，在战后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不难发现，战时中美两国建立并相互维系的租借援助关系具有鲜明的目标，即共同抵抗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其内容也基本限于军事作战的范围，因此具有较为积极的意义。日本投降之后，中美两国原先的共同敌人不复存在。美国基于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尤其是远东地区战略利益的考量，决定继续向中国提供租借援助。与战时相比，战后美国对华援助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其蕴含的外交目的亦有别于战时，故宜另作研究。为此，本书将集中探讨抗战期间的中美租借援助关系。这一时期，美国援华的行为主体是美国政府，就中方而言，虽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两个并存的政权[①]，但国民政府却是其中真正的行为主体。这一方面是由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尚未成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政府，中国外交的行为主体仍然是国民政府[②]。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是美国援助的直接对象和实际上唯一的接受方。于是，战时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租借援助关系也就成为本书的研究对象。

---

① 抗战时期，中共政权也曾努力争取享有美国对华租借援助的分配权，并在此过程中初步积累了对美外交的经验，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归于失败。刘中刚、孟俭红：《抗战后期中共对美援的争取》，《抗日战争研究》2007 年第 1 期；于化民：《短暂的合作：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解析》，《抗日战争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② 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文献评论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主要盟国之间的租借援助关系而言，海内外学界迄今已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曾负责执行租借援助计划的美国官员斯退丁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就出版了《租借援助：胜利的武器》[①]一书，结合工作经历对美国租借援助计划的由来与实施情况进行全面叙述。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学界兴起了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热潮。各大学纷纷建立地区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展对亚洲、欧洲、非洲、中东、拉美等地区的研究。其中，对当时的苏联与东欧地区的研究力量最为庞大。随着冷战的开始与两极格局的形成，研究苏联已上升至关系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美国的苏联学逐步兴起[②]。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中外学术群体纷纷检讨二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并将战时美国对苏联的租借援助视作两国对抗的助推力量，因此涌现出大量相关的研究著作[③]。同时，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法国以及北非、中东、拉美等国家或地区的租借援助关系研究也陆续出现了相应的成果[④]。近年来，黄逸仁、马科维兹(Ronald A. Markowitz)等人又对二战时期美国与主要盟国间的租借援助关系作了全方位探索，对中美

---

① Edward R. Stettinius, *Lend-Lease: Weapon for Vic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44.

② 郭金月：《美国苏联学的起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1期。

③ 较具代表性的英文著作如 Albert Loren Weeks, *Russia's Life-saver: Lend-Lease Aid to the U. S. S. R. in World War Ⅱ*,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4; Hubert P. Van Tuyll, *Feeding the Bear: American Aid to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5*,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Leon C. Martel, *Lend-Lease, Lo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old War: a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9; Raymond H. Dawson, *The Decision to Aid Russia, 1941: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4; George C. Herring, *Aid to Russia, 1941—1946: Strategy, Diplomac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Robert Huhn Jones, *The Roads to Russia: United States Lend-Lease to the Soviet Unio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9。中文代表作有朱贵生：《论战时美国对苏联的租借援助》，《世界历史》1986年第11期；时殷弘：《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苏租借援助》，《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

④ 英文著作如 P. H. Butler, *Air Arsenal North America: Aircraft for the Allies 1938—1945, Purchases and Lend-Lease*, Hinckley: Midland Publishing, 2004; Alan P. Dobson, *U. S. Wartime Aid to Britain, 1940—1946*, London; Dover; New Hampshire: Croom Helm, 1986; James J. Dougherty, *The Politics of Wartime Aid: American Economic Assistance to France and French Northwest Africa, 1940—1946*,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8; Thomas David Yielding, *United States Lend-Lease Policy in Latin America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1983; A. Jacqueline Swansinger, *The Magic Carpet: Lend-Lease in the Middle East, 1940—1944*, Ph. D. Dissertation, Rutger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New Brunswick, 1988。中文论著则有朱贵生：《租借法剖析——论二次大战时美国对英国的援助及其互助》，《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

租借援助关系也略有提及①。

与研究美国和苏联、英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租借援助关系的丰富成果相比，中外学界尚未有深入研究战时中美租借援助关系的专门著作。不过，任东来、吴景平、王正华、李淑姿等海峡两岸的学者曾在此问题上作出过学术贡献。

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任东来的硕士论文拉开了中美租借援助关系研究的序幕②。此后，他又通过专题论文对战时美国租借援华进行总体评价，认为这项援助既有助于中国抗战，同时又是美国控制中国的有力工具③。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任东来于198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不平等的同盟——美援与美中外交关系研究(1937—1941)》，此论文经修改于1995年正式成书，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为名出版。该书至今仍是国内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对华援助的代表作。作者认为，“美援”是抗战乃至战后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体现，亦是该时期中美外交的基本特点。中国政府的求援活动与美国政府的援华政策相结合，构成1937至1946年两国外交的主线④。美国对华援助的性质属于安全援助(Security Aid)，其内容庞杂，涵盖经济与军事项目，形式包括商业信贷、平准基金贷款、无偿贷款(赠款)、租借援助等，而军事方面的“租借”援助是当时最重要的美援之一。为此，作者专门统计了美国租借援华总额、时间分配、租借物资类别等内容，论述了美国对华租借政策的变化、租借物资的运输以及中美双方为控制、分配、使用租借物资而进行的较量。

与此同时，吴景平撰写的《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也是一篇极具分量的专题论文。作者在全面解读中美双方多种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战时中美租借援助关系的形成过程、协议文本、美国租借援华总额、中国对美回惠租借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考察，深入分析了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者还首次指出了租借援助对战时中国国内财政经济造成的不容忽视的影响。美国对华实施租借援助，使中国无需举借更多外债或动用更多外汇

---

① 黄逸仁：《论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与英苏法三国之租借关系》，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Ronald A. Markowitz, *Lend-Lease from Its Inception to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M. A. Disserta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2004.

② 任东来：《“租借”援助与美国对华政策(1941—194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任东来：《评美国对华军事“租借”援助(1941—1946)》，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系合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二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

④ 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购买军火。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巨额的回惠租借也大大加剧了国统区原已存在的物资匮乏、物价腾涨、收支失衡、通货失控的局面①。大陆方面除任东来、吴景平之外，还有部分学者的论文涉及战时中美租借援助关系，比如田金星的《租借物资与美国对华政策》(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 年第 1 期)、刘达永的《〈中美租借协定〉之"防卫用品"供应初探》(载《天府新论》1996 年第 6 期)等。台湾方面，王正华曾在《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一书中辟出专门章节，论述战时美国的租借援华②。而李淑姿撰写的论文《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以租借法案为中心的探讨(1941—1945)》③则是另一代表性成果。

如今，二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已是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相关著作林林总总，内容也各有侧重。就传统状况而言，聚焦政治、军事关系的较多，经济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薄弱④。近年来，随着一大批新史料的开放，战时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军事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突破⑤。目前探讨战时美国援华或中国争取美援的著述主要采用三种研究路径。最为常见的一种路径是将美援附属于战时中美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的整体加以对待，使之成为解释两国盟友关系动荡的主要论据。在谈到租借援助时，往往会把它纳入军事援助或军事合作的范畴，并根据掌握史料的多寡进行叙述和探讨。

此类著述首推 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在美国出版的一批英文专著，如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C. Romanus and R.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Time Runs out in CBI*, U.S.

---

① 吴景平：《抗战时期中美租借关系述评》，《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②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六章第一节"租借法案与军火输华"，台湾环球书局 1987 年，第 227—251 页。

③ 《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 1 期，1995 年 5 月。

④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综述》，《美国研究》1994 年第 4 期；汪熙、王立诚：《中美经济关系研究述评》，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240 页；杨雨青：《抗日战争时期中美经济关系研究述评》，《历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

⑤ 比如，杨雨青副教授就利用美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多家典藏机构的档案资料，对抗战时期的中美经济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详见杨雨青：《美援为何无效？——战时中国经济危机与中美应对之策》，人民出版社 2010 年。战时中美军事关系最新的重量级著作当属齐锡生教授的《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该书 2011 年 5 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与"中研院"合作出版，后被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引入大陆，于次年 6 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

Army in World War Ⅱ series, Washington D.C., 1953, 1956, 1969;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The Macmillan Co., New York, 1970; Michael Schaller, *The U. 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Margaret B. Denning,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in World War Ⅱ: Cooperation and Dispute among Nationalists, Communists and Americans*, Berne: Peter Lang, 1986 等①。

其次则是美国一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如 A. F. M. Shamsur Rahman, *United State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ssistance Policy toward China during World War Ⅱ and Its Immediate Aftermath*,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8; Zhang Xiaoming, *Toward Arming China: United States Arms Sales and Military Assistance, 1921—1941*, Ph. D. Dissertation,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 1994; John D. Plating, *Keeping China in the War: The Trans-Himalayans "Hump" Airlift and Sino-United States Strategy in World War Ⅱ*, Ph. 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07.

中文方面较为典型的有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再版；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马建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军事合作》，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陶文钊：《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王建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台湾联经出版公司与"中研院"2011 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等。

以上著述在提及租借援助时或详或简，角度重心互不相同。总体上看，早期中英文著述的讨论重点实际上是美国租借援华的政策与实践，在写作时较多利

① 这些著作已有部分被译成中文出版，分别为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下)，商务印书馆 1984 年；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用美方资料，比如美国国务院编辑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 FRUS)有关远东及中国的年度分卷、《美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美中关系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英文全称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中译本为《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出版的《摩根索日记(中国)》(*Morgenthau Diary (China)*)以及勃鲁姆(J. Blum)根据摩根索日记撰写而成的《摩根索传》(*From Morgenthau Diaries*)等，这些资料时常为国内研究战时中美关系史的学者转引。近年来出版的部分专著，逐渐开始重视中方资料的挖掘，最常用者莫过于中国国民党党史会 1981 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相关分册、《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相关分册，以及出版时间较早且以收集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为主的《美蒋勾结史料》(孟默闻编，北京新潮出版社 1951 年版)。与早期著作相比，这些著作在论述中国争取美援方面似有更多着墨。

如果进一步总结的话，可以发现这些著述大都认为租借援助既是维系中美同盟关系的纽带，也是造成两个盟友间冲突与摩擦的根源之一。任东来在硕士论文中明确指出了租借援助对中美两国各自的政治意义。韩永利则认为，战时美国对华援助的力度与美国对中国抗日战场战略需求的动态变化形成正比关系，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租借援助上。齐锡生所著《剑拔弩张的盟友》一书以两国互动的方法论搭建起一个新的史实框架，齐著的学术贡献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按照不同于传统英文著作的逻辑，对《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罗马努斯与森德兰(C. Romanus and R. Sunderland)著三卷本美国陆军军史等已刊“旧史料”进行了解读，为重新诠释中美军事合作打下了基础；其次是大量使用中美双方领导人的个人文件，中国方面主要是《蒋介石日记》与宋子文的私人档案，美方则是时任陆军部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的私人文件。这些“新史料”不但有助于克服此前著述普遍存在的中方资料短缺的弱点，同时也有利于揭示战时中美军事互动过程中真正的权力中心所在；第三，在依靠新旧史料纠正错误、还原事实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比如，他认为美国租借援华规模有限与中美盟友关系陷入不稳定状态有直接关联，而这种不稳定状态又可以从史迪威与蒋介石两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政治体验中找到原

因。一方面，史迪威常常按照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误读误判中国的政军情势，而蒋介石也在对待史迪威问题时习惯用“中国式”的行事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以至于三番五次暴露出优柔寡断的作风，最终让自己陷入噩梦不止的境地。又如，1943年5月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围绕“陆军优先”还是“空军优先”的著名争辩，本质上并非两种战略观念的冲突，而只不过是一场争夺中国战区租借物资分配权的“内斗”。

第二种路径是从考察战时中美经济关系的角度切入，将美援当作相对独立的体系予以讨论。作为美援体系的重要环节，租借援助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金融状况和工业生产均有过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曾长期在华担任财政顾问的美国人杨格（Arthur N. Young）就出版过系统论述中国与战时外援的著作[①]，该书按照时间顺序纵向还原了战时中国接受美援的演进过程，并着力体现各种形式的美援与中国财政经济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对于租借援助也有一定篇幅的叙述。

此后，任东来著《争吵不休的伙伴》与杨雨青著《美援为何无效？》两书的主题均直接聚焦在“美援”之上，尽管前书研究的“美援”还包括抗战结束之后的内容，但两人著作的重点无疑都是在抗战时期。如前所述，任东来认为战时美国援华内容主要涵盖经济与军事两大类别，其中经济援助的形式包括商业信贷、平准基金贷款与无偿贷款（赠款），而“租借”则应归于军事援助之列。除了对美国对华租借援助做过详尽的统计与分析外，他还是在中国对美回惠租借问题上有深入研究的少数学者之一。如果说任东来对“美援”的论述仍然着眼于反映中美抗日同盟关系的阴晴冷暖，那么杨雨青笔下的“美援”则更强调与战时中国经济危机起伏之间的关联。她在书中将美国对华援助分为借款、物资和战时生产三种形式，而借款又可细分为易货信用借款、平准基金币制借款与无息财政借款，物资则细分为易货贸易物资和租借法案物资。与任东来相同的是，杨雨青也将租借物资视为军事援助。但是，杨著并没有如任著那样为租借援助辟出专门篇章，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写作的重点有所不同，以至于在动笔前就已将“美援”定位在经济援助之上。不过，作者在叙述战时生产局的活动时，提到了其如何有效利用租借物资的问题，因此事实上对租借援助也有所涉及。

①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